

引 言

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中华帝国在外来侵略的压迫下，进入了一个被动近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且寓寄民主化的深刻要求，也就是说，中国人必须实现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从社会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转化。因为是被动的，这个进程必然是痛苦而缓慢的。

作为古老帝国的首都——北京，最强烈地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也最先酝酿着革命和反抗。正是这种屈辱与痛苦，使“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抱残守缺思想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与天争胜”“变法图强”的强烈呼唤，使千百年来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理纲常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城市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物质生活的基本结构，冲击和改变了人们以往的古板、单调、等级森严、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千百年来所遵循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无不打上时代的标记。

本书拟介绍近代北京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特

点，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及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人际关系诸方面的变化。体现在新旧社会交替时期，旧的等级制度的衰败；封闭的生活走向开放；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不断扩大；社会交往日趋多层次化的趋势。

一、城市居民的兴衰变迁

在激烈的时代变迁中，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都在沉浮变动。新生的阶级诞生了，衰微的阶级败落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旧戚新贵的更迭

自清开国以来，作为皇子王孙“天潢贵胄”的宗室亲贵，一直享受着极优裕的待遇，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王公贵族集团的人数越衍越多，据统计，清末宗室有男丁 8000 余人，其中有爵秩的亲王 10 位，郡王 2 位，贝勒 5 位，以及贝子、公爷、将军等共 168 位。他们和他们的妻妾、儿女、亲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

几百年来，代代相传的王公贵族在政治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分任要职，统兵治政，执掌军国大权。如醇王府三兄弟载沣、载洵、载涛分别任摄政王、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长期担任领衔军机大臣，后又任“责任内阁”的内阁总理大臣。他的儿子载振也任农工商部尚书。肃亲王善耆清末担任民政部尚书，掌管全国的警察和民政事务。就是隐郡王溥伦，清末也主持资政院，担任农工商部尚

书。

在生活上，他们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每年他们都有一份丰厚的俸禄，尽管清末由于国库空虚，宗室亲贵的俸米、俸银减半改为“实领”亲王年俸银仍还有 5000 两，俸米仍是 1496 石；郡王俸银 2500 两，俸米 748 石；贝勒俸银 1250 两，俸米 374 石；贝子俸银 650 两，俸米 194 石；镇国公俸银 350 两，俸米 104 石；辅国公俸银 250 两，俸米 74 石；……至于奉恩将军仍有俸银 66 两，俸米 15 石。有的王公还特蒙恩宠，年支双俸，或每岁多支俸银若干两。宗室王公担任各种官职，还可以再领取俸银禄米。如兼任一个宗人府宗正，一年还可再领津贴银 2400 两。可见清帝对王公贵胄是多么的优待。

每个贵族都有一处或几处富丽堂皇的府邸，房屋几百或上千间。如睿亲王魁斌在东城石大人胡同的睿王府有房 500 间，另在西郊有一座别墅（即后来的燕京大学旧址）。庆亲王奕劻的府邸在地安门外定阜大街，府内分五个大院，还建有戏楼、X楼等处，大小楼房近千间，是北京城内豪华宏大的王府之一。此外另有承泽园、泄水湖、苦水井等地的花园三处，还有几十所铺房。醇亲王府出了两个皇帝，所拥有的财产当然超过其它王公，仅府邸就有两处，一在宣武门内太平湖，一在什刹海净业湖北岸，房屋有上千间。

此外各个王府都聚集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和古玩字画。庆亲王奕劻父子二人揽权纳贿，聚敛了巨量财富，宣统三年（1911 年）北京的报纸曾披露庆亲王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服饰的详细清单，估计价值在一万万两白银以上。睿王府聚集和收藏了大量字画、古玩，仅存放古玩、陈设的房子就有一

百多间。醇亲王府在 1931 年其儿媳妇唐怡莹抢夺家产，仅王府的财物就“拉走了几十车”。此外，各王府还有多达几十万亩的庄地，每年能有大笔的地租收入。如睿王府在河北及东北有庄地三十余万亩；每年收地租二万元左右。肃亲王府占有庄地三十余万亩，牧场一百二十多万亩，可获上万两收入。顺承郡王府自清初共经营了 268 年，聚集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价值连城。还有庄地三十多万亩，分布在京郊各县和东北各地，每年都有可观的租银。

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王朝垮台了，皇亲贵戚的种种特权一下全被剥夺了。他们被降为“公权私权与国民同等”的国民中一员。每年丰厚的俸银禄米取消了，这无疑对他们重大的经济损失。但据清帝逊位时签定的皇族优待条件“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的规定，他们还可拥有大量的房地产和金银细软，继续过优裕的贵族生活。然而实际上王公贵族的处境急剧变化，短短几十年的功夫，大批王公贵族纷纷没落。当时报纸上常常登载“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新闻。鼎鼎有名的睿亲王多尔衮的后裔——睿亲王府，不过十年，万贯家财就荡然无存。他的子孙以摆小摊、做短活维持生活。晚清重臣庆亲王奕劻死后不到八年，分得巨额产业的第三子载掇由于吃喝嫖赌，挥霍无度便把家产全部花光，于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的子孙最后竟沦落到拣破烂为生，常常连一日一餐都维持不了。拥有巨量资财的顺郡王府十几年的功夫便将祖业变卖殆尽，其子孙只能靠作画卖钱勉强度日。清末曾活跃一时的溥伦贝勒去世后，他的儿子吃喝玩乐，家产挥霍一空，最后靠卖破烂为生。境况稍好一些的王公贵族，也只是没有沦落到缺衣少食，贫病交加的

地步而已。就是出了两个皇帝的醇亲王后代，家境也日趋下降。祖先代代相传的金银、珠玉、书画、古董以及王府、园林，陆续典当、出卖，两个府邸也变卖的变卖，被占的被占，自己住在原饲马的院落里。

王公贵族急剧败落的原因不外以下几种：

(1) 变卖家产，坐吃山空，生活却更加腐化堕落。

辛亥革命以前，清廷对王公子弟有种种限制，如不许和各部院大臣来往，不许和封疆大吏往来，不许无事串亲戚，更不许无故离京等等。王爷及其子弟闲居府中，闲得无聊，就玩玩古玩字画，抽抽大烟，唱唱戏，或与清客下棋谈戏等以消磨岁月。辛亥革命后，王公贵族子弟冲破一切限制，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击下，他们不惜变卖家产，更加变本加厉地摆排场，比阔气，尽情挥霍。以睿亲王魁斌的两个儿子中铨、中铭为例，他们为了和富人比富，就卖东西修房子，修花园，每个房间都要按装一部电话。府里有八抬大轿，还购置了两部汽车，八辆马车，这就花费钱财无数。在穿着上，更是追求新异，同样的衣服要做三件，是为了让衣服上的花儿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比如，早晨穿的衣服花儿还未开，中午穿的衣服花儿正盛开，到了晚间穿的衣服花儿又闭上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特别爱赌钱、嫖妓。1919年他们卖西郊别墅得到的两万元钱，仅两天便连花带赌挥霍光了。他们的挥霍和家里的收入成反比，钱没有了，可王爷的架子还要撑着，于是就卖东西，“以破产来维持”王爷架子，摆着王爷的排场。不到十年，珍贵东西就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就卖坟茔地，仅二十多年的时间，豪华富贵的睿王府就彻底破落了。最后一代睿亲王也因“衣食不周”而去世。庆亲王

奕劻的三子载掇，在其父死后，分得了万贯家财，他吃喝嫖赌无所不及，是天津跑马场及赌场的常客。他曾经一个晚上赌输一、两所房子。尽管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但他仍要摆排场，雇着不少佣人，出门车马齐全，开支很大。没有钱，就卖珠宝玉器，衣服首饰，再就卖王府，仅仅几年的功夫就把分得的家产全部花光。载掇也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2) 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们缺乏起码的生活能力和社会常识。

几百年养尊处优的豪华生活，养成了王公贵族的寄生、腐朽、庸懦无能的生活习性。他们没有能力也不会考虑如何筹划经营今后的生活，家中的一切经营事物只推给管事的处理。面对各方面的敲诈勒索，只是束手无策，任人宰割。1924年，睿亲王府欠人家钱，被债权人告到法院，法院把王府的房子给查封了，并且把一百多间房内的古玩陈设也给查封了。按照当时的情况，这样一座王府足可抵偿欠款，根本不致于丢掉一百多间房的珍宝古玩。这些珍宝古玩都是无价之宝。可是睿亲王中铨太无能了，一听说法院查封，就“吓得躲了起来”，管事家人，看到冰山已倒，也辞职不干了，剩下的王爷福晋和阿哥、格格，“更是没有办法，认为一贴封条，房子和东西就都属于人家的了”，于是赶快搬家，把偌大的王府和无数珍宝都抛给人家了。还有的王爷虽不是肆意挥霍，但是“没有生活经验”，不知如何筹划经营家庭财产，更不知勤俭，仍然摆王爷架子，一切事物听凭管事的处理，以至家境急剧衰落。

(3) 军阀政客的强抢豪夺。

王公贵族的权势丧失后，他们便成为军阀政客敲诈勒索

的对象。为了求得军阀政府的“保护”，他们不得不献给军阀政客大批钱财和珍贵文物。例如，徐世昌竞选大总统时就拿走皇室价值 360 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庆亲王为保护自己的安全，经常向掌握北京治安的官员赠送古玩、珍宝，并经常设宴款待。而他们的百般讨好，并没有换来军阀对他们的支持，只不过成为他们敲诈勒索，聚敛财富的一个新来源而已。张作霖曾强将克勤郡王的卖庄地款一万元吞没。尽管王府再三请求，张作霖根本不理。顺承郡王偌大的府邸被奉系军阀强行占去，几经交涉，奉系军阀才只给了七万银元即强行买走。庆亲王府在 1928 年为方振武军占为司令部，临走时，将所有的家具物品携带一空。醇亲王府在抗日胜利后被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占去北府的一半，载沣无法对付国民党。……素以精明强干著称的肃亲王善耆，仅因欠了德国德华银行六万五千两银子，民国政府在德国公使、领事的压力下，竟冻结了善耆价值百万两的房产、地产和股票。

(4) 权势的丧失致使租银收不到，大片庄地被盗卖，加之庄地佃农、壮丁掀起了抗租夺地的斗争，使王府遭受到极大的经济损失，加速了王府的衰落。尤其是庄地上管事的、庄头乘机盗取王府财产，吞没租粮，偷典庄地。如加郡王銜贝勒载涛，在奉天省六个县内有大片庄地，原来按时交租。辛亥革命后原庄地的庄头连年拖欠租银，且“屡催不纳，刁狡玩梗之极”。还有的庄头将部分庄地偷偷买与他人，“侵吞肥己”。肃亲王在奉天省的庄地世代由庄头承领，辛亥革命后，一些庄头一再上控，坚称所领王庄土地，是自己的祖遗产业，他们和地方官府勾结起来，将王庄土地据为己有。肃王府也明白这是由于“该庄头等，自国体变更以来，以本府

声势今非昔比，故皆起心藐视，非特连年拖欠租款，现在并欲将府产悉行吞没”。总之，民国以后，王公处境急剧变化，十几年的光景，基本上就都没落了。

清王朝垮台后，北洋军阀的一批新贵为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又似走马灯一般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轮番上场。先是袁世凯利用实力和阴谋手段窃取到大总统的宝座，继而为实现其称帝的迷梦，对外不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对内雇用一批御用文人大肆鼓吹君主立宪推行复古运动，拼凑各种“请愿团”，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在北京演出了一幕幕复辟帝制的丑剧。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以门生故吏、同乡同学、姻亲、结义拜盟等封建关系结成一个个集团。其中有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等。他们投靠帝国主义为自己的靠山，彼此依附，共同荣辱，为本集团的利益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为了争夺统治大权，各派集团先后在北京制造了种种夺权的丑剧，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多次发动军阀战争，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军阀们的混战，造成北京政局动荡不安，内阁更迭频繁。从 1912 年至 1928 年，北京政府更换了 10 次元首，45 届内阁，平均 4 个月就换一届内阁，最短的内阁只有 6 天。

在思想文化上，军阀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复古尊孔，妄图以封建的三纲五常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袁世凯下令尊孔，张作霖也下令定礼制、祀孔……他们公开宣言以孔教为国教，下令各类学校都要精读儒家经典，并大肆褒扬节妇烈女，为维护他们的专制统治大造舆论。

军阀们利用权势，除了苛敛农民外，还通过向商人摊派或借款等等方式聚敛巨款，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财产。他们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而且见工商业利润成倍增长，开始向近代企业投资。如直系军阀曹锟的财产除购买房地产、开当铺外，主要就是投资新式工业。1920年他与鲍贵卿等创办恒源纱厂，自任总理。工厂资金400万元，其中曹氏家族的股份为82万元，占资本额的五分之一强。曹氏家族还开办了直东轮船公司、罐头公司。此外他们在金融和工矿企业还有大量的投资。如在天津交易所、中日实业公司、北洋保商银行、边业银行、农商银行等金融业都有投资，并在井陘煤矿、遵化兴隆铁矿、保阳火柴公司等企业有大量投资。曾两任总统的黎元洪投资的企业也相当多，工矿企业有中兴煤矿、中原煤矿、长兴煤矿、六河沟煤矿、龙烟煤矿等12家；投资的银行有中华汇业银行、中华懋业银行等9家银行。其中在中华懋业投资20万元，在中华汇业投资16.7万元。^①张勋仅在久兴纱织公司和中兴煤矿就投资170万两。张作霖仅在边业银行的投资就达500万元。^②民国后银行业开始发展，到1925年北京的银行发展到23家，占全国银行业的16%。这些银行的股东大多是军阀和北洋政府官员。如北京的盐业银行是由袁世凯的表弟、河南督军张镇芳独资创办的。大陆银行的股份中，冯国璋和张勋各占五分之一股。金城银行90%的股份都是军阀和官僚的。

据不完全统计，拥有1千万以上财产的军阀政客有23

① 《银行月刊》第17卷第12号。

② 《银行月刊》第5卷第4号。

人，2千万以上的有10人，曹锟和张作霖都拥有5千万以上的财产。^①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占有多少不等的财产。据一个很不完全统计，71名军阀官僚私人所拥有的财产达6.31亿元，超过当时北京政府全年财政收入。

军阀们在各地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北京也都有豪华的住宅。他们的新邸很多都是购买破产的清朝遗老的府第。还有很多的军阀强行购买王府作为他们的行辕。张作霖就以7万元强买了顺承郡王府第。东城东厂胡同东口原荣禄府第，为袁世凯购买赠以黎元洪居住。

军阀们的生活奢侈淫靡。有人说北洋系的督军起码有姬妾10人以上，此外私娼、女优、打鼓的、良家女子几无不嫖。张勋65岁了，还以1万元的重金纳一15岁的小妾。张作霖每日生活甚奢，除精衣美食之外，还要吞云吐雾、叉麻将、吃补品。号称长腿将军的张宗昌每次来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们便莺莺燕燕拥向他的府第。

2. 从士大夫到新知识分子

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历来聚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或是以科举考试就任朝官、京员或是来京游学的名学子以及参加科举考试的各地举子。自清代以来，他们大都居住在宣武门外一带。他们或购置房产或赁屋而居。在宣南还兴建了一大批会馆以接待各地来京的仕宦、学子。清代曾在北京居住过的著名学者有顾炎武、洪亮吉、孙星衍、钱大

^① 《北洋要人私产之大略统计》，《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4期。

听、纪昀等等，还有史学家万斯年、张廷玉、赵翼，书法家、诗人翁方纲，数学家梅文鼎以及后来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政治家林则徐、魏源等等。

北京的知识分子群体，对学问、对事业表现了执着追求的精神。清代学风，经历了由空泛到求实的转变，学者们以汉学为标帜，以“久而益坚，砥砺前行”的精神，以及献身事业的勇气，在浩瀚如洋的文献中不遗余力，苦苦地探求，在他们聚集的宣南地区洋溢着浓郁的学术空气。他们中有为保存整理古代文献而抛却万贯家财者；有一贫如洗但嗜书成癖者；有身居闹市而澹泊守志者。正是这种对事业的献身精神，激励他们在北京撰写了诸多宏大著作，极大地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近代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目睹清中叶国内“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政治局面，探索经书的“微言大义”，成为嘉道年间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对林则徐、魏源以及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也在北京住过多年，他受林则徐的嘱托编写成《海国图志》，使中国人初次了解世界。曹雪芹在北京创作了不朽名著《石头记》（《红楼梦》），……

这些学者在闲暇时，也相互来往，或访谈学问或以文会友，诗赋唱和。道光十年，林则徐、龚自珍、黄爵滋、魏源、张维屏等经常在宣南雅集，以诗聚会，抒发忧国忧民，以匡救时弊为己任的抱负。他们在政见上还互相声援，彼此提携，在日后严禁鸦片，开放风气，匡济时弊等方面都起了相当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国家的危亡，深深地刺激了一代又一代的

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中，一批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他们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探求真理的勇气，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地更新知识，传播知识，运用知识，探求真理，在我国许多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最先行动起来，在伟大的群众运动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震撼了近代科举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赴京赶考的志士，立即联合在京会考的举人1300多人，在宣外的松筠庵集会，议决全体联名上书，他们勇敢地冲破士民不准上书言事的“厉禁”组成浩大队伍，前往都察院上“万言书”。书中不仅提出“拒和、迁都、再战”，而且还阐明了一系列变法维新之策。这便是近代北京知识分子第一次大的政治请愿活动，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消息传遍京城，震动朝野，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公车上书”开创了思变言变的风气，发动了具有全国性的救亡图存运动，并成为近代启蒙运动的起点。

为了推动变法维新，北京宣武门外各省会馆成为维新变法的舆论中心和活动基地。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外城琉璃厂后孙公园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学会组织——“强学会”，从而结束了有清以来不准会盟结社及私人讲学的局面。他们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份民办报纸《万国公报》（后改称《中外纪闻》），该报介绍世界各国情况，鼓吹变法维新，在朝野之间造成的震动，为以后的百日维新作舆论准备并开启了民间办报之风。虽然这一报一会由于清政府守旧官员的破坏，仅存在了四个月，但“自此以往，风

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京师，组学会，建学堂，办报馆……至 1898 年全国共有学会 78 个，仅北京就有 14 个。^① 其中有康有为等组织的保国会、粤学会，林旭等发起的闽学会，宋伯鲁等人发起的关学会，以及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一个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由北京推向全国。尽管百日维新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勇敢开拓精神为以后的革命树起了榜样。

20 世纪初，在兴学校，废科举的过程中，北京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知识群体与封建士大夫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接受了不同于旧式书院的新式教育，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学文化和技能。他们的知识结构、文化修养及思维方式都迥异于上一代的知识分子。随着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改变了过去作官、授课、作学问浑然一体的状态，出现了较明确的分工，形成了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哲学社会科学界、新闻出版界等等。

北京知识分子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数量多，层次高。北京是政府机关所在地，这里云集着大批高文化水准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同时北京又有占全国总数 14% 的大学和专科院校，其中全国最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都在北京。各大学的在校生达万余名（据 1919 年甘博的调查）^② 北京的各类学校约有 387 所，教职员工有相当的数量。北京还有占全国九分之一的报刊、杂志及通讯社、出版社等，聚集了大批的新闻出

^① 参见李文海《戊戌维新时期学会组织》，《戊戌维新运动史论》。

^② 甘博《北京社会调查》纽约出版，1921，第 134 页。

版人员。此外，这里还聚集了大量的高级人才。据统计，1917年已归国的留学生总数不下5000人，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北京。据1916年有人调查，在北京的1653名归国留学生的就业情况，如下表：^①

政界	学界	报界	青年会	医界	军界	赋闲
1024	132	16	3	23	56	399

许多中外知名的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如：铁路专家詹天佑，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张相文、章鸿钊、李四光等等，学者、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以及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马寅初、王国维、朱自清、陈垣、陈寅恪等，报人彭翼仲、邵飘萍、林白水等著名学人都荟萃北京。

北京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最先接触西方文化，直接地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从他们产生起便投入到社会革命的斗争洪流中去。1903年京师大学堂师生发起拒俄大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并上书请愿。这是北京青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参加爱国活动，开启了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先河。

面对军阀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人们苦苦探求的问题。1917年（新青年）杂志迁来北京，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迅速团结在她的周围，形成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他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把斗争的锋芒直接

^① 《青年会与留学生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4卷第9期。

指向封建统治核心思想——儒家的纲常伦理。他们尖锐地批判吃人的礼教，反复论证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从北京迅速地传遍全国，极大地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唤起了他们追求新事物，向往新生活的强烈要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中夏等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成果是进行了文学革命。当时许多要求变革的人士都对封建八股文风深恶痛绝，1917年胡适、陈独秀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在北京率先展开了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1918年5月鲁迅在北京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后又写了《孔乙己》、《药》等著名小说，为文学革命做出了典范。1918年以后，北京的许多报刊都改用白话文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我国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未来的曙光。他们第一次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北京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初的基地，并在这里涌现出一批最早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家：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高君宇、张太雷等。1920年10月，他们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开始着手组织工人运动。1921年初，邓中夏等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办起了最早的劳动补习学校，并创办了工人刊物《劳动音》，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实现了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从这里点燃了北京工人运动的火种。从此，北京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开辟了一个新的局

面。

北京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薪俸收入，除了极少数人生活条件比较优裕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比较窘迫。1914年7月，北京政府公布的《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规定：大学校长月薪400元，高等师范学校及专科学校校长月薪300元，大学教员180—280元，预科教员140—240元，高等师范学校教员160—250元，专科学校教员160—250元。大学教员服务五年以上，每年还有数量不等的津贴。像北大、清华著名教授的薪俸则更高。从当时的物价水平来看，大学教师的薪俸是比较优厚的，对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学水平都是有利的。不过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数不多。中小学教师收入就相对差了些。尤其是小学教师的工资，通常是一年一聘，每月薪俸40元，如再管理学校行政事务，薪俸稍多一些，但如每星期授课不足24小时，则酌量减薪。由于社会的动乱，政府对教育的不重视，拖欠中小学教师薪金的事时有发生，使他们的生活常常陷于窘境。

尽管政治局面动荡，生活不安定，但“五·四”后北京知识阶层却不乏文化的相对自由和宽松。各种文学沙龙和聚会风行一时：文学研究会、新月社、语丝、未名、莽原等等。1924年前后，在闻一多家中经常举行诗歌朗诵会，聚集了朱湘、刘梦苇、饶盟侃等抒情诗人；徐志摩、胡适等在松树胡同7号定期举行的聚餐会和俱乐部，聚拢了新月派的同人，梁启超、张君勱、林长民、丁文江、林语堂、余上沅、丁西林、凌叔华、林徽因、闻一多等都经常到会；在八道湾的“苦雨斋”也经常高朋满坐，逐渐形成以周作人为中